

# 洪武大移民：来自湖南浏阳的新例证

曹树基

## 一、引言

二十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修博士学位课程。我的研究方向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迁移”。湖南地区的移民史之所以成为我的研究重点，不仅是因为业师谭其骧先生曾经以《湖南人由来考》作为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之题，更在于何炳棣先生对于此文的批评。作为一个后来者，在面对两位大师的不同意见时，我准备采取了调和的策略，即根据何炳棣的意见，对谭文进行修正。

具体地说，谭其骧先生以湖南五种府县志中的氏族志为资料，对于氏族的来源及其迁入的时代进行细密的统计，得出结论：湖南人中之多数来自江西，其中多数来自元末明初。何炳棣不以为然，他认为谭文所依据的地方志中没有包括那些在清代才迁入的新移民；这批新移民迁入的时间太短，成为当地显赫家族的机会太少，所以，这些家族被收入地方志的可能性也少。也就是说，由于谭文中的样本分布及样本质量存在问题，所以，谭文的结论是不可靠的。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何炳棣对于谭其骧的批评都是成立的。于是，我的研究工作首先从搜集更多的氏族志入手，试图通过更多样本的发现与分析，弥补谭文之缺憾，得出新的结论来。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找到的有关湖南氏族资料，多达 22 种。覆盖湖南 32 个县，而谭文所依据的地方志仅覆盖 9 县。在湘东地区，亦即何炳棣所称清代移民迁入的地区，我所找到的氏族资料，包括平江、醴陵和汝城三县。三县分布于湘东地区的北部、中部和南部，相当均匀。不仅如此，与谭文另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在我所发掘的各类氏族资料中，有几种在记载移民氏族迁入时间、原籍的同时，还记载了他们各自的人口。平江、醴陵和汝城三县的氏族资料，都包含有这方面的内容。湖南氏族资料的这一品质，使得我的研究有了超越前人的可能。

在确定这些资料可靠性的基础上，我的分析展现出完全不同于谭文的移民史：氏族是人口的集合，却不是人口本身。谭文对于湖南人的研究，实际上只是对于湖南氏族的研究，而不是关于湖南人口的研究。在没有遭到过毁灭性的人口破坏的地区，氏族的历史越长，所包括的人口越多。不过，氏族的历史越长，所经历的天灾人祸也就越多，其人口的年平均

增长速度也就越慢。不同时代的氏族所具有的不同的人口增长速度，可以通过数学模型来表达。藉助数学模型，将氏族研究转为人口研究，湖南移民史从此不再是氏族史，而是人口史。

关于湖南人由来新证的研究发表以后，中央研究院的刘石吉教授告诉我，他的同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黄彰健教授曾经出版过他父亲编撰的《浏阳乡土志》一书，其中就有氏族志一章。这本著作的出版地，是在台湾，大陆似乎至今未有任何单位收藏。笔者虽然多次来台，皆行程紧迫，从未得暇浏览此书。今年得东吴大学历史系之邀，来台客座，时间充裕，借得书归，本欲细细品尝，无奈会期紧迫，草成此文，以见教于同仁。

## 二、《浏阳乡土志·氏族志》的质量评估

在台湾出版一部大陆的乡土志，《浏阳乡土志》可能是唯一的一部。若不是友人相告，笔者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部清末撰修的湖南乡土志，竟会在台湾印行。依黄彰健教授在《印行后记》中所叙，知著者为其父黄征。黄征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卒于1931年。黄氏先世自江西南昌迁浏阳，至黄征为七代，查《浏阳乡土志》中“朝阳街黄氏”条，知其先祖于乾隆中迁入。光绪十八年（1893年），邑人谭嗣同回乡省亲，黄征应聘，偕谭氏抵南京。四年后，即1897年，黄征罹病，谭延医诊治不愈，送其归乡，黄归乡后不久，“疾有瘳”。次年戊戌，北京政变，谭嗣同赴死，黄征幸运地逃过此劫。在乡期间，黄征在任教长沙中路师范的同时，兼任县乡土志局总编辑，课余纂辑《浏阳乡土志》共十五卷，1907年书成，未能印行，书稿由其子携来台湾。

在清末各地编撰的乡土志中，“氏族志”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初等小学教材的乡土志，由于体例限制，其篇幅有限，编者不可能详述邑中每一氏族之由来，只能述其大者。所谓大族，或因人口众多，或因官宦显赫。以笔者所见，通常所记氏族，十几个或几十个而已，鲜有例外。《浏阳乡土志》卷六《氏族》的编撰有所不同，所收可以统计的单一氏族，多达143个，其文可举数例：

唐家段 唐氏 其先曰彪，元末自袁州万载迁浏。子二，希贤、希哲。贤生钦俊、钦杰、钦英，哲生钦明、钦鉴，析为五支。俊英明鉴之裔，分居小河琥珀段严坪等处。惟钦杰裔世居唐家段。今传二十二代，丁千余。

大石岭 唐氏 其先曰亲仁，宋咸淳三年自善化迁浏。今传二十三代。

### 乐段里 唐氏

### 罗锦坳 唐氏

在上引记载中，浏阳唐氏的四个大支，皆入书中。然细加分析，有迁入原籍及迁入时代者，只有两支。其中有人口记载者，只有一支。然此一支并不指由江西万载迁入浏阳的唐彪的全部后裔，而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即居住于唐家段的唐惟杰的后代。唐惟杰是唐彪的五个孙子之一，另外四个孙子的后裔人数不详。

与乐段里唐氏和罗锦坳唐氏类似的氏族记载还有 64 个，合计则为 66 个，是为不可统计者。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三类氏族记载：

滕氏，在浏为稀姓，莫知其聚族之地。同治二年有滕定春，陕西汉中府阵亡，附祀昭忠祠，见县志。

或为：

尤氏 邑有尤氏，不详其聚族之地。

或干脆为：

### 闵氏

此三类氏族共有 83 个，与“乐段里唐氏”的记载合计共为 149 个，都是不可统计者，其数量已经超过有原籍及迁入时间记载的氏族总数。也就是说，在《浏阳乡土志》中，超过半数的氏族居址不明，来历不明。不过，这一数据并不能表明浏阳县的氏族志编撰水平不高，因为，既便是在 1980 年代，湖南平江县在编修氏族志时，全县现住人口有 341 个姓氏，其中 100 人以上的姓氏共 141 个。这 141 个姓氏所涵盖的人口占全县人口的 95%。也就是说，在人口的意义，对于其余 240 个小姓的忽视是可以的。在浏阳，那些不知聚所的姓氏，真的是可以忽视的小姓吗？

黄征在例言中所称：“此次编辑，虽由局制为表册，驰函四征，然私家谱牒，蕴秘者多，所获终不过十之一二。”查湖南省图书馆主办的“湖南氏族源流”网，关于浏阳李氏共有 24 条，其中与江西有关的共 11 条。这 11 条中，有浏阳麻园李氏、浏阳、长沙大路李氏、浏阳山下里李氏、浏阳山下里李氏、浏阳葩南李氏等五支未被《浏阳乡土志》所收录。另有一居

住于合口段的李氏，《浏阳乡土志》只记其名，未载其迁移之实。这六支中，除两支分别于元至正二十三年及永乐年间迁入外，其余四支皆于洪武年间迁入。浏阳氏族尚有许多未被收入《浏阳乡土志》中，可能是作者不愿将书付印的原因之一。

重要的问题是，平江县 141 个超过 100 人以上的氏族，可以涵盖全县人口的 95%，而《浏阳乡土志》收录的此类氏族仅为 33 个，且统计数据写作“千余”或“三千有奇”，少有写作“一千六百有奇”的。合而计之，如果不将“余”或“有奇”计入，33 个氏族的人口约为 80800 人。如果将“千余”读作 1500，将“三千有奇”读作 3500 的话，33 个氏族合计人口也只能达到 110500。

浏阳县当时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黄征所称“最近之调查”，大约发生于光绪末的几年，分区调查的结果是，全县共 151076 户，793586 “丁口”，户均 5.25 “丁口”，可见这里的“丁口”就是人口。只不过，1953 年人口普查时，浏阳县人口为 785723，较之光绪末年，不增反减。在国共两党的战争中，浏阳属于军事区域。战争造成的人口死亡，究竟有多少，尚不可知。所以，还不能对光绪末年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评论。

假定光绪末年浏阳县的人口可能有高估的成份，以 1953 年人口为基点，按照 5% 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光绪末年，浏阳人口也有 61 万余。这 33 个氏族所含人口最多只占全县总人口的 18%。以此衡量，在可供统计的 143 个氏族中，除了已有的 33 个有人口记载者，其余各氏族的平均人口规模不会少于这 33 个氏族。也就是说，《浏阳乡土志》中有关氏族人口的调查，缺失得实在是太多了。

在《浏阳乡土志》的氏族志中，还有一类关于氏族人口的记载，呈以下方式：

**龚家塘 李氏** 其先曰火德，福建汀州上杭人。其裔孙于国初时先后迁浏。在浏者凡一百七十有八支，合建祠于龚家塘，称龚家塘李氏。传次七、八代、十代不等。丁四万有奇。

氏族志中所载李氏共有 11 支，龚家塘李氏是其中的一支。龚家塘李氏由 178 个分支构成，他们尊奉一个共同的祖先——李火德，号称来自一个共同的地点——汀州上杭。李火德号称五代时从陇西迁入闽地。龚家塘李氏在其旗号下集结，组成一个“合同式宗族”。从单一氏族的统计来看，“国初”或康熙年间迁入的客家人，全都是从广东东部地区迁入的。因此，我判断龚家塘李氏，也来自粤东地区。

还有一支与此相似的邱氏，其迁徙由来十分复杂，兹摘引如下：

指背冲 邱氏 其先曰必仁，福建汀州上杭人……（必仁）赘汀州上杭，生子二，福祿，为迁浏之所自出。福十二世孙慕南迁浏东双冲，今传十一代。福十六世孙日辉，康熙中迁浏东双江口，今九代。祿曾孙伯二六一……迁抚州金溪……顺治中迁浏西茶园，今十代。珂彩迁袁州宜春，子金玉迁浏西朱木港，今十一代。福玉迁浏西北斗湾，今九代……必仁之裔在浏者二十余支，合建祠于北关外指背冲，号曰从祥祠邱氏，共丁六千有奇。

氏族志中叙述了 21 支邱氏从福建、江西迁入浏阳的过程，此处从略。从引出的这段文字看，指背冲邱氏也是一个“合同式宗族”。可惜的是，与龚家塘李氏一样，这 21 支氏族的迁入的时间并不一致，而每支的人口又不明确，所以，分别进行人口统计可能性不大。

总的说来，《浏阳乡土志·氏族志》关于氏族迁移与氏族人口的部分，比湖南的一批县志中的氏族志要差，但却要比同时代的乡土志详细得多。这使得本文既可以从可以统计的 143 支氏族入手，展开浏阳氏族及来源的讨论，也可以通过有人口记载的 33 个氏族之统计，展开浏阳氏族与其他地区氏族关系模式之讨论，并藉此将论题集中于洪武大移民。

### 三、浏阳与平江、醴陵氏族模式的比较

从族的角度看，龚家塘李氏和指背冲邱氏多达 199 支，约占浏阳氏族总数的 40%。这不仅反映浏阳县清代氏族的细碎，更反映“三藩之乱”后闽粤客家人对湘东山区移民规模之浩大。清代的移民史暂且不讨，兹将清代以前氏族列表 1。

表 1 浏阳县清代以前的氏族统计

迁入时代	江西								合计
	湖南	赣西	赣中	赣北	江西	广东	其他省	不详	
五代			3	1	1		2		7
南宋	6	2	2	4	1		2	2	19
元末	4	4	1	4	1		2	4	20
洪武	5	4	2	13	7		3		34
明中后	11	1	5	7	2	1	2	2	31
合计	26	11	13	29	12	1	11	8	111

资料来源：黄征：《浏阳乡土志》卷六《氏族》，中央研究院印行，1967 年。

从氏族的来源上看，在全部 111 个氏族中，自江西迁入的共有 65 个，占 58.6%。所谓

“江西填湖广”，由此而可见。从迁入的时间上看，江西人迁入浏阳，自五代始，南宋时代，迁入者众，元末明初，蔚然成风。元末明初自江西迁入浏阳的氏族，多达 36 族，占清代以前历代迁入总数的 55.4%。这一结果与谭其骧所得结论基本一致。只不过要强调指出一点，这里统计的是氏族，而不是人口。

将浏阳、平江与醴陵三县的氏族迁移进行比较，结果可见表 2：

表 2 浏阳、平江、醴陵三县清代以前的氏族构成

迁入时代	浏阳	百分比(%)	平江	百分比(%)	醴陵	百分比(%)
汉			1	1.4		
东晋				0.0	1	0.4
唐			14	19.7	2	0.8
五代	7	8.8	4	5.6	3	1.2
北宋			10	14.1	3	1.2
南宋	19	23.8	19	26.8	14	5.8
元代	20	25.0	11	15.5	41	16.9
洪武	34	42.5	12	16.9	179	73.7
合计	80	100.0	71	100.0	243	100.0

资料来源：同表 1 及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9 页，第 102 页。

由于元代的氏族大多数是在元代末年迁入，所以，元代与明初基本可以视作同一个时间。在元末明初以前，浏阳县的氏族比例，低于平江，却皆高于醴陵。元末明初，浏阳的氏族，仍介于平江与醴陵之间。此正如在地理上，浏阳县处于平江县与醴陵县之间一样。

以元末明初的氏族计，平江合计只占全部氏族的 32.4%，浏阳占 67.5%，醴陵占 90.6%。按照我的定义，浏阳和醴陵都属于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区，而平江则属于人口补充式移民区。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将长沙府划入湘中区，而浏阳正属于长沙府。浏阳的资料证明，以府为单位的分析，是合适的。不过，从表 2 中的数据比较中可知，元末明初，醴陵几乎是在废墟上重建，而浏阳仍保持有相当数量的土著氏族。从这一点上来说，浏阳与醴陵不同，而与平江相似。

行文至此，关于浏阳县的氏族类型基本明了。只是因为 33 个氏族有人口的记载，本文还是想对这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详见表 3：

表 3 浏阳县有人口记载的 33 个氏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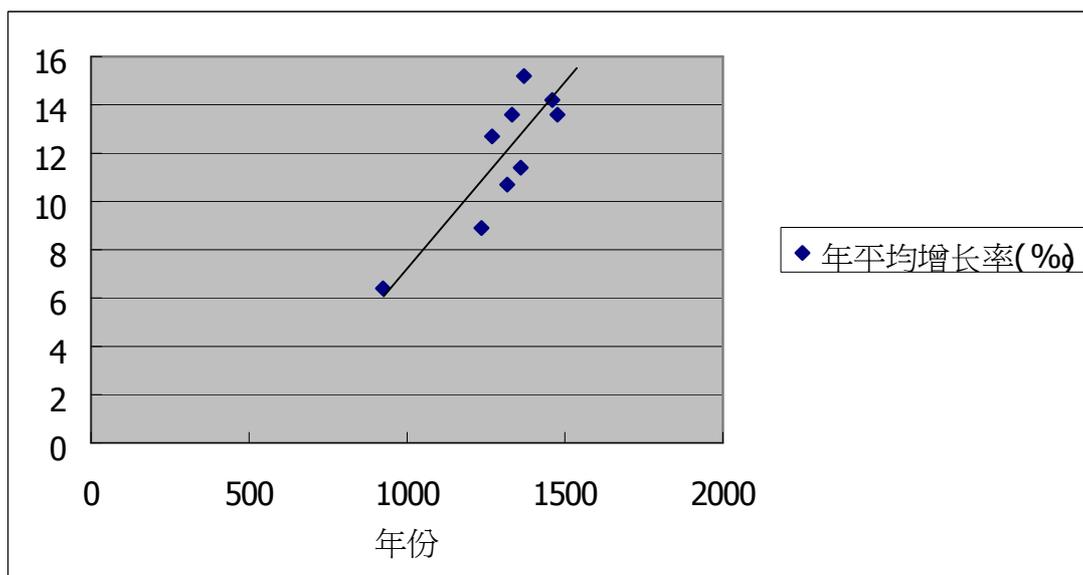
年份	族数	1900 年人口	每族平均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924	1	2500	2500	6.4
1236	1	1800	1800	8.9

1269	2	4800	2400	12.7
1317	1	400	400	10.7
1333	6	13200	2200	13.6
1360	5	11650	2330	11.4
1370	15	45200	3013	15.2
1460	1	2550	2550	14.2
1476	1	1550	1550	13.6

资料来源：同表 1。

由于可供统计的氏族数量太少，每个氏族的平均人口忽高忽低，似乎并无明显的规律。历代氏族人口的增长速度，也是高低互见，与平江与醴陵两县数据的变化颇有不同。然而，从总的趋势看，浏阳氏族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与平江和醴陵相似，也大致呈直线增加的趋势。

图 1：浏阳县 33 个氏族人口增长趋势



可以拟合浏阳氏族人口的线性方程如下：

$$Y = -7.420 + 0.015X \quad (R = 0.86)$$

$$(-1.165) \quad (4.355)$$

方程成立，且呈显著相关。而在上引著作中，笔者证明：

平江县人口补充式移民区氏族与人口的关系为：

$$Y = 2.211 + 0.0054X$$

醴陵县人口重建式移民区氏族与人口的关系为：

$$Y=-6.41+0.0125X$$

将浏阳与平江及醴陵两县比较，很显然，浏阳县的氏族人口模型与醴陵近，而与平江远。相对而言，浏阳县氏族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醴陵，我相信这可能是统计造成的误差。因为，我将《浏阳乡土志·氏族志》中所有“有奇”与“余”都视作整数的一半，如“三千有奇”即写作 3500，如果视作整数的四分之一，如“三千有奇”写作 3250，浏阳方程将会更接近于醴陵方程。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这一结果也令我猜测这 33 个氏族人口的登录，本身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并不是刻意选择的结果。由于样本太少，其散点的线性配合度较平江和醴陵为差，但就样本本身的质量而言，却是相当不错的。另外，这也说明在以前的著作中，笔者以府为单位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

#### 四、“丰城瓦子街”及其相关问题

在《浏阳乡土志》所载迁自江西的氏族中，有 14 族迁自丰城，其中最早的李氏来自后梁开平年间，记载为“江南西道之丰城迁浏阳膏田”，计 36 代。次则为后唐同光二年，于氏“自洪州丰城县瓦子湾迁浏”。再次则有宋端平三年，傅氏来自“江南西路隆兴府丰城县”。这三条涉及唐宋时代的移民资料，已经有提及丰城县瓦子湾的。在其他 11 条资料中，还有三条提及“瓦子街”或“瓦子巷”。他们的迁入时间分别为元至治二年及洪武初年。

在湖南省图书馆主办的“湖南氏族源流”网站上，检得 6 族李氏，自江西迁来，却不为《浏阳乡土志》所载。其中与丰城县瓦子街有关的是麻园李氏和浏阳、长沙大路李氏。麻园李氏于洪武初年迁楚，浏阳、长沙大路李氏迁于洪武十二年，只不过，后者关于家乡的全称是：“江西丰城县瓦子街胡茫花墙”。在同一资料关于浏阳山下里李氏和浏阳东乡李氏原籍的记载里，前者称：“江西丰城县大坡头湖茫里”，后者称：“江西丰城县湖茫”，迁入的时间皆为元末明初。

近些年来，由于寻根热的兴起，有人遂将自家谱中有关迁移的内容摘录于网上，是可称为“网上寻根”。键入“瓦子街，丰城”字样后，用“百度”进行检索，在互联网上查得 9 个与此有关的氏族，分布在长沙县，其中 4 族为元末或洪武年间迁入，另有 4 族分别迁于元代、明正德、明万历和明代。最令人称奇的还是长沙吴氏，“明洪武七年由江西吉安府吉水县瓦子街泗州庙荷塘神迁长沙雾阳乡五十七都”，似乎吉水县也有一个“瓦子街”。

无独有偶，在“罗氏通谱网”上，有广西玉林罗氏，“始祖讳常元，字仕忠，号大明，原籍江西吉安府西门外瓦子街，元至正丙午二十六年生，明洪武乙丑十八年游洋，丁卯二十年拔贡，授广西布政司理问之职。建文二年庚辰谢事，游历郁阳，仰慕西山之灵秀，于是定居富民乡开基立业”。从这段文字看不出哪些字句来自族谱，哪些字句是贴者新加的，但可以确定的是，玉林罗氏是洪武年间宦游入桂的。宦游者以瓦子街——只不过是吉安府城的瓦子街——作为自己的原籍，确实一件很新鲜的事。玉林及周边地区并无大批江西籍移民迁入，却是来自福建或广东的客家人的定居地。同样根据互联网的搜寻，居然发现在福建省上杭县城，也有一条“瓦子街”。在今天广东、广西的许多地方，有许多氏族据称来自上杭县城“瓦子街”。有人实地考察，将一条以前堆满瓦砾的街道，强解为“瓦子街”。玉林罗氏的“吉安瓦子街”，是否是从“上杭瓦子街”粘贴而来，尚不可知。

关于“丰城瓦子街”的传说区域，以长沙府为主，兼及其他地区。如果扩大搜查范围，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收获，但这一传说分布的主要区域，却是基本固定的。这让我联想起在湖北的许多地方，元末明初来自江西的移民，大多称原籍为“南昌瓦子街”、“南昌朱市巷”和“南昌筷子巷”。对于这三个地名的真实性，并不需要证明，我生长于此城，从小在辗转于这三条街巷，嬉戏玩耍，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的街景街貌。在互联网上，还可以查到2005年南昌市政府撤消瓦子角街道办事处的消息。由此，我以为自称同一地区迁自“丰城瓦子巷”的移民，是因为在“南昌瓦子巷”集结，误将原籍写作“丰城瓦子巷”。玉林罗氏的原籍一度令我的看法有所改变，迁入广西玉林的宦游者，并不需要集结于南昌，但由于玉林地区存在大批来源于“上杭瓦子街”的客家人，我相信玉林罗氏的“瓦子街”只是以讹传讹的结果。

赵世瑜采用“集体记忆”作为基本概念，对于山西大槐树的民间传说以及族谱记载进行丝丝入扣的分析。他认为：

族谱中虽大量提及洪洞迁民之事，而且言之凿凿，但其中疑点很多，很难被视为有力的证据。特别是在这些族谱中，还将我们前面曾举到的某些传说故事写入，作为家族历史留传，族谱这样的书面文本又成为口述传说的载体，共同夯实和传递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

上引族谱与网络世界中关于“瓦子街”的记载与传闻，似乎可以为赵氏的研究提供一个注脚。例如，在上引资料中，迁自“丰城瓦子街”氏族，最集中为元末明初，却有早自五代

的，也有迟至明代中后期的。由于大部分族谱撰修于清代，所以不排斥五代迁入的氏族关于原籍“丰城瓦子街”的说法，可能受到同一区域其他氏族的影响。对于玉林罗氏有关“吉安瓦子街”的解释，也是同样的。

“南昌瓦子街”或“丰城瓦子街”与“山西大槐树”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南昌瓦子街”是一个地名实体，而“洪洞大槐树”则是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士绅的建构——那棵大槐树也是他们新栽的。“南昌瓦子街”是一个小的移民地名，其移民分布的范围主要在以长沙府境为中心的湘中地区以及鄂东鄂中地区，而“洪洞大槐树”却涵盖了差不多整个华北。如果我们将同时代的湖北麻城、鄱阳瓦屑坝、苏州阊门、山东枣林庄等元末明初的移民地名联系起来，再将各个移民原籍地名所对应的移民迁入地联系起来，就可以绘制出一幅与山西大槐树相比美的移民地图。南方移民的迁徙路线由东南向西及西北，其范围包括今四川、湖南、湖北、安徽、苏北等相当广泛的区域；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迁移路线由西北向东及东南，其范围包括今河南、河北、安徽与山东。两大移民区的交汇线大致以淮河为界。

“洪洞大槐树”所显示的明代初年的民籍移民，可用著名的“汲县移民碑”所展示的那种整齐划一的移民组织作为例证。历史文献中关于明代初年移民组织的记载实在太多，我曾经根据《明实录》的有关记载，验证山东东昌府地方志中记载的移民屯社是正确的。这里所指的移民屯社，是民籍，而非军户。

最近，张靖华等在巢湖东岸地区发现了一批明代初年来自江西“瓦屑坝”的移民村落，这些村落的形制基本相同，称为“九龙攢珠”。统一规划的街道、民居和排水系统，竟然与江西南昌县向塘镇的古村落是一致的。来自 google earth 的卫星照片，可以让一个建筑学的外行，也能明显地看出这一点。<sup>1</sup>江西瓦屑坝是今天鄱阳县莲湖乡的一个村庄，数百年前濒临鄱阳湖，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港口。根据安徽省一些地区的族谱资料进行分析，来自“瓦屑坝”的移民，实则来自赣东北的许多县份，却不见有来自南昌附近的。目前关于江西地区古村落的研究尚未完全展开，还不知赣东北的古村形制是否与巢湖地区的瓦屑坝移民村一致。

## 五、讨论

谭其骧先生于 1931 年发表《湖南人由来考》一文，开启了采用地方志研究中国史的新方向。地方志的内容虽然是讲述地方之事，但却由地方政府组织撰修，仍可列为官修史书的

<sup>1</sup> 张靖华、郭华瑜：《“九龙攢珠”——巢湖北岸移民村落规划与形成背景初探》，同济大学 2007 年中国建筑史学术讨论会，未刊稿。

一种。不过，地方志中氏族志，因采集民间族谱而成，所以，此类资料可以视作民间文献。谭其骧先生关于洪武大移民的研究，本质上是利用民间文献进行的研究。

在一般情况下，后代为前代编修的正史资料，是后代人记前代事，这与家族资料的性质相同。在湖南等地，大多数的族谱修于清代中前期，这时距离他们的祖先迁入当地，已经有近 300 年，迁入原籍出现些微的混乱，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混乱，与正史中的错讹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或许是记忆的错误，或许是有意的改造，都是可以理解的。

本文中的氏族人口分析，与以前笔者所作同类研究一样，验证了民间文献的可靠性。不仅如此，本文还进一步证明，即使是那些编撰较为粗糙的民间文献，仍然具有可靠的一面，仍不失为研究地方历史乃至中国历史的好材料。

以民间文献为主体的移民叙事，将中国分割为若干个不同原籍的不同移民区。南方移民的多源性与北方移民的单一性，因此而形成强烈的对比。人口相对较少，区域相对狭小的南方移民区，无法与人口相对较多，区域相对广阔的北方移民区相提并论。于是，比较而言，“洪洞大槐树”可以用来塑造大的区域认同，乃至令今天的学者以为他们在塑造现代国家的认同。这一具有高度理论意义的分析，在我看来，其实不过是区域人口追求共同祖先来源的一个策略，是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与现代性无关。至少在分析诸如“丰城瓦子街”一类的移民时，现代国家认同之类的理论分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